

大学生政党认同与入党积极性研究

——基于江苏省六所高校的抽样调查分析

■ 苗红娜 余泓波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0023;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摘要】作为社会发展的新生力量,大学生群体的入党积极性,既与党员队伍建设息息相关,也反映了年轻世代的政党认同。受访者“递交入党申请书”的态度与行动是其入党积极性的有效观察指标。问卷调查发现,六所不同类型高校的学生中,近八成受访者已经递交或准备递交入党申请,其入党积极性受到多面向的政党认同影响:政党价值中的理想信念认知、情感信赖,政党组织认同中日益严格的入党标准感知、正面积极的党员形象认同,均在不同程度上显著提升了大学生的入党积极性。与此不同,政党绩效认同虽有助于其政党情感生成,却未能催生其入党意愿,政党情感认同与政党参与偏好存在生成机制的心理差异。此外,家庭、学校与专业等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大学生入党积极性的政治社会化效应。

【关键词】大学生 政党认同 入党积极性

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内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1年6月5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共计约9514.8万。自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6月5日共发展党员473.9万名,其中学生党员187.2万名^[1]。可见,大学生已成为新党员的重要发展对象。大学生的入党积极性直接影响到党员队伍的整体结构,对巩固和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然而,大学生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外社会舆论环境和多元价值观挑战,网络信息的传播、官员腐败渎职以及环境污染等社会治理问题都对大学生的政党认同产生影响,使得高校学生入党意愿与动机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2]。本文从政党认同的层面来探究影响当代大学生入党积极性的因素,以期为政治文化研究和政党发展实践提供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撑。

一、文献回顾

(一)政党认同

作为个体在心理上对某政党的归属感,“政党认同”被认为是“用社会学方法解释政治现象来反对理性选择方法的典范。”^[3]自1960年该概念被提出以来主要应用在西方选举研究领域,

收稿日期:2021-11-08

作者简介:苗红娜,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政治文化与心理;

余泓波,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政治文化。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势的群众基础及其巩固机制研究”(课题编号:21ZZC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考察政党认同如何影响公民对议题、候选人和政治事件的评价,已成为西方研究大众政治行为的中心理论^[4]。

关于政党认同的来源及存续变化,西方学术界观点不一。以沃伦·米勒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政党认同是一种长期存在的情感取向^[5],具有外生性,是政治社会化的代际传递过程。作为相对持久的心理认同和情感归属^[6],政党认同在个人层次和宏观层级都具有极大的稳定性,而个人对政党的评估等短期因素影响政党认同的结果往往是由于测量方法上存在的错误或者误差造成的^[7]。而以富兰克林和杰克逊为代表的学者强调政党认同是个体基于对政党、党魁及对该党执政期间国家经济、政治发展状况等的评价而产生的认知和情感状态,代表了主体对政党的评价性反应,即理性个人依据政党的社会和政治活动的评价来更新和调整其政党的归属和依附,政党认同受到议题、政绩和媒体渲染的个人形象等因素的影响^[8]。

国内学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及其实践为研究背景,在反思西方政党认同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政党认同是指政治主体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对政党所产生的一种思想、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是其对政党做出的一种肯定性的心理反应和行为表达。”^[9]

在量化研究中,这一概念被用于测量中国民众对执政党的态度,研究对象包括了公务员、农民、大学生和非公企业主^[10]等群体。但学者在对不同群体政党认同测量中使用的指标各异。比如以“自己对下一代加入共产党或民主党的满意度”来测量公务员群体对共产党和民主党的认可度;以“对执政能力内涵的了解程度”和“对党内民主的态度”考察对党的政策态度和对执政党的情感态度;以对党群关系、党际关系、党政关系和党与人大关系和谐度的评判作为政党认同的重要指标^[11]。在对农民政党认同的研究中,将政党认同测量等同于村民对村党支部各项能力的评价^[12]。

对大学生政党认同的研究较多,一是将政党认同作为政治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有学者将政治认同区分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制度认同和政党认同四个层次^[13],抑或从政党认同、政策认同和国家认同三个方面分析政治认同^[14];或者将政党认同与身份、发展、政策、体制和文化认同相结合测量中国的政治认同^[15]。二是依据社会认同理论对政党认同进行测量,并区分去个性化的高层次融入、对党内环境认知的吸引力认同以及建设性认同三个维度^[16];这种划分是从认同的对象维度(你/我划分)、认同的态度指向(建设性/盲目性)方面对党整体评价的区分,并没有涉及到对党内部各要素和结构评价。三是从政党内容构建政党认同的测量指标,包括对党派的了解程度、对身边党员的看法、对政党制度是否适合我国现状的评价以及“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中国长期执政,并能领导我们建设现代化”的判断^[17]。

这种多样化的测量指标虽然从不同角度提供了关于我国政党认同的片段式研究发现,但由于概念化操作与测量体系的系统性不足,既削弱了其实证框架在不同群体间的适用性,也未能从经验层面较为完整地呈现民众政党认同的全貌。因此,本文将细化和深化政党认同的实证研究,开发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认同指标体系。

(二)入党积极性、入党意愿与入党动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围绕“入党意愿、积极性和动机”形成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主要以大学生群体为主,包括入党意愿和动机的概念、主要类型、影响因素以及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在内容上研究大学生入党动机的期刊论文要明显多于研究入党意愿和入党积极性的论文。从概念上来看,这三个概念相互联系而又有差异。“入党动机”作为“触发个体追求并激励其达到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这一崇高目标的内部动力”^[18]和心理动因,解释了“为什么想入党”的问题。有研究认为入党动机包括了共产主义信仰和社会贡献、个人发展的功利思想以

及先进党员及同侪群体的影响^[19]。改革开放40年中大学生的入党动机经历了信仰型动机的一元化时期、信仰与利益并存的二元化时期,以及进入21世纪后的多元化动机^[20],包括了理想信念型、情感影响型、功利追求型、自我虚荣型、盲目从众型五大类型^[21]。入党意愿解决了“想不想入党”的问题。其受到知觉行为控制、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等因素的正向影响^[22]。而本研究中的“积极性”指的是个人想要采取某一特定行为的心理状态以及行为倾向,具体而言是“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心理倾向和外显行为,即大学生是否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这一行动,以及“想不想递交入党申请书”的意愿。因此,“入党积极性”中行动与意愿两个维度具有心理与行为的一致性。

目前国内关于“入党积极性”研究相对较少,对于“入党意愿”和“入党动机”研究也以定性研究为主,缺少统一、明确的衡量标准。而对“入党意愿”和“入党积极性”影响因素的探究多从个人、家庭、高校、社会等方面展开。其中,个人层面主要是个人价值观念,即价值观多元化以及对党的错误认知和观点可能导致大学生政治热情下降;家庭层面的家庭氛围、主要成员的信仰以及教育方式方法都会影响大学生入党意愿的深度和强度;高校层面强调高校党组织和党建工作对增进大学生党性认知和入党意愿的影响;社会风气方面则强调市场化所带来的功利务实主义、官场贪腐对党形象的影响以及党的执政绩效所产生的能力评价。可以看出,这些论述为分析“入党积极性”提供了参考,但由于缺少实证数据检验,使得上述相关关系有待证实,对政党发展的政策建议针对性不足。而且作为大学生是否愿意入党的影响因素,需要具体考察其对个体入党观念、态度的影响。基于此,本文认为有必要从大学生对执政党的认同这一内部动力出发考察大学生对政党的认知、情感和评价如何影响其是否入党的行为倾向选择。

二、研究设计:概念、假设与数据

(一)概念测量

1. 入党积极性

由于入党意愿具有内隐性,为避免入党意愿和动机的直接提问可能产生的社会赞许性偏差,因此本研究以“是否提交入党申请书”这一外显政治行为作为入党积极性的衡量指标,并在设计选项时加入了“是否准备递交”的意愿选项,同时,为避免社会期许或政治忌讳等原因使受访者违背本意选择积极性更高的选项,我们设计了“没有递交入党申请,但准备递交”的中间选项。

2. 政党认同

作为一个所涉甚广的概念,现有文献对政党认同的概念化方式大致有两类:一是结构式的概念界定,强调政党意识形态、政党组织、政党领袖和政党绩效,构成了形塑政党认同的意识性资源、组织性资源、魅力性资源和功绩性资源^[23]。二是过程性的概念界定,通过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评价以及参与投票或自觉地遵守政党章程、拥护党的领导等政治行为体现出来^[24],并形成政党的执政效能和执政价值^[25]。其中,政党认同的结构式界定能够较好地多维度的指标中进行操作化测量,因而本文也将采取该方式。

借鉴学界关于政党认同的概念及测量维度以及新时代“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的建设总体布局,本文从价值、组织与能力三个方面进行界定,包括基于理想信念与信赖情感的政党价值认同、对党组织建设与党员形象感知的政党组织认同,以及对执政绩效评价的政党能力认同。如前文所述,由于学界对此方向尚缺乏系统性的测量指标体系,相关探讨多分散于不同的研究主题之中,因此,本

文作为一项探索性尝试,从三个方面测量政党认同,虽然所涉题目较多,但力求整体测量框架的清晰与合理。此外,本研究将若干人口统计变量、学校与家庭状况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纳入统计分析。

(二)研究假设

入党积极性可以反映出个体的政党参与偏好。不同于西方政党政治中个体的政治社会化环境(如父辈的政党偏好)、政党的社会基础与政策偏好等影响模式,中国共产党和群众之间更加强相互依赖的“血肉联系”。大学生之所以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是个体与政党之间的情感纽带与心理连接的呈现。因此,本文将政党认同作为重要的政治认同,主要从政治认同这一心理路径解释大学生的入党积极性。依据政治认同理论对制度—绩效和价值—共识的重视^[26]以及中国共产党认同多维来源的现实,认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大学生入党积极性的影响路径包括了基于理念宣扬与价值传播的理想信念与情感依恋的思想吸引路径、聚焦党组织自身建设与榜样感召的组织吸引路径,以及基于党的绩效评价的有效性吸引路径。

思想吸引路径。信念代表稳定的态度,是党建设的重要内容,政党成员信念的强度和可信度是决定政党未来命运的重要因素^[27]。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党员时尤其强调个体的理想信念,即“思想上先入党”。然而,不能回避的问题是确有少部分大学生从功利角度选择递交入党申请。根据心理学认知相符理论,个体的信念是支撑其进行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这种信念既包括了基于对政党理想信念的理性认知,也包括了对党意识形态的情感依恋和心理连接。由此,我们提出研究假设1和假设2。

假设1:控制其他变量,大学生对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的认同越强,其入党积极性越高。本文选择“中国梦”这一意识形态资源作为测量设计的焦点,从认知与评价两个维度探究理想信念层面的因素与大学生入党积极性的关系。

假设2:控制其他变量,大学生对中国共产党的情感认同越强,则其入党积极性越高。依据之前的研究,将心理连接分为信任与依赖两个方面^[28]。

组织吸引路径。社会认同理论强调个体为减少不确定性会倾向于将自己归于某个组织,并在思想和行为上与该组织保持一致。当还没有形成组织认同时,组织本身的发展状况、发展前景以及道德吸引力会成为个体是否愿意与该组织产生关联的重要因素。党的十八大以来,日益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对党员的发展及日常管理越发规范与严格。这种党组织自我净化的举措会强化大学生对党内制度和组织建设的认同,进而增强其对党发展的信心和期待,成为其积极入党的重要动力。而党组织的吸引力既有来自于党对自身党员队伍建设的严格标准,也有来自普通党员的先进表率。身边的普通党员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和思想能更好地体现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大学生看来,其对身边普通党员形象的认同,有可能会影响其入党积极性。由此,提出假设3和假设4。

假设3:控制其他变量,大学生对党组织建设的认同越强,则其入党积极性越高。

假设4:控制其他变量,大学生对身边党员形象评价越高,则其入党积极性越高。

有效性吸引路径。已有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治理绩效极大提升了民众的政治支持水平^[29],并强化了党组织的合法性和吸引力。基于此,我们提出假设5。

假设5:控制其他变量,大学生对党的执政绩效评价越高,其入党积极性越高。

为检验以上假设,本文使用Stata15进行多项逻辑斯蒂回归分析。

(三)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了南京大学“中国青年价值观调查”团队组织开展的大学生政治社会化问卷调查的相关数据资料。2015年10至12月,课题组对江苏省内六所大学2015年秋季入学的本科生进

行了抽样问卷调查。在每一所大学中,均采用分层整群抽样(Stratified-cluster Sample),最终选取六所大学250个初级抽样单位中的53个,有效样本3759个。关于选择依据、抽样过程等调查细节详见本课题组的已有研究^[30]。

三、数据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1. 入党积极性

统计结果显示,在未入党的3677名受访学生中^①，“已经递交入党申请书”者为1760人(47.87%)、“准备递交入党申请书”者为889人(24.18%);而“没打算递交入党申请书”者为837人(22.76%)。可见,绝大多数被调查对象(72.05%)有很强入党积极性。

2. 政党认同

表1 大学生政党认同的测量指标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认同内容	测量方式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政党价值	理想信念认同	对“中国梦”的认知与信心	中国梦认知(有专门了解=1)	3677	0.768	0.422	0	1
		中国梦实现:目前我国发展道路能实现中国梦吗?	3533	2.941	0.548	1	4	
		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个人梦想和追求能实现吗?	3527	2.874	0.552	1	4	
	情感认同	对党信赖	政党信任	3733	4.771	1.112	1	6
政党依赖			3729	3.248	0.897	1	4	
政党组织	组织建设认同	对党的建设的举措与实效的认同	党员招募标准变化(1=宽松了很多,4=严格了很多)	3522	2.879	0.825	1	4
			党对党员的纪律规范变化(1=宽松了很多,4=严格了很多)	3513	2.902	0.845	1	4
	党员形象认同	对一般党员的形象认同	真心要通过党风廉政建设来净化党组织(1=完全不真心,4=完全真心)	3519	3.016	0.628	1	4
			对身边一般党员的印象	3509	6.320	1.800	1	10
			身边一般党员的个人能力	3513	6.319	1.724	1	10
			身边一般党员个人道德素质	3507	6.381	1.663	1	10
政党能力	执政绩效认同	对党治国理政的绩效的认同	身边一般党员的入党动机	3509	5.478	2.015	1	10
			国防和对外政策	3595	6.788	1.914	1	10
			国民经济发展	3601	6.768	1.681	1	10
			中小学教育	3599	6.231	2.271	1	10
			医疗卫生	3600	5.576	2.017	1	10
			公民的政治权利	3600	5.055	2.076	1	10
			环境状况	3601	4.165	1.990	1	10
			官员廉洁程度	3601	3.808	2.055	1	10
贫富差距	3600	3.657	2.067	1	10			

① 由于本次调查以大学新生为主,考虑到新生的平均年龄及党员发展所需的时间周期,其中党员比例较小,均为高中时期入党,仅有1.68%。因此,在后续的多变量分析中排除了“中共党员”“民主党派”等,剩余3677个样本。

统计数据显示,政党价值层面上,大部分学生(76.8%)对中国梦有专门了解,包括阅读过相关的宣传新闻和评论、阅读过相关专门刊物或理论文章,或者参与课程学习或专题讨论,并且83.47%(2949人)认为目前我国的发展比较或完全能够实现中国梦,79.27%的受访者肯定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个人的梦想和追求能得到实现。对于党组织的信任和依赖均处于较高的水平,88.09%受访大学生认为共产党值得信任,79.79%受访者认为“离不开”共产党。

在政党组织层面上,大学生更认同党组织通过党风廉政建设净化党组织的决心,对党员招募标准化和党员纪律规范都认为“严格了一些”,分别有83.89%、70.90%和69.86%的受访大学生认为党组织真心通过党风廉政建设来净化组织、党员纪律规范和新党员招募标准更为严格。

对身边党员的整体印象、能力评价和个人道德素质的均值均高于中位数6,相对而言,对身边一般党员入党动机的纯粹性评价稍低。这四个题目的Cronbach's α 值为0.905(>0.7),具有较好信度。基于理论意涵的同质性与数据分布的一致性,本文认为党员形象的测量具有较为明显的单一内在维度特质,因此,回归分析时将四题均值作为党员形象认同变量纳入模型。

大学生对于党的执政绩效评价在不同项目上具有明显的差异,评价较高的是国防和对外政策、国民经济发展和中小学教育,均值均大于6;在医疗卫生和公民政治权利上评价较为保守;大学生对环境状况、官员廉洁程度和贫富差距的评价相对较低。由于受访者在不同指标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评价,且高评价与低评价的指标在理论意义上的确具有不同的侧重点,因此未简单求其均值,而是借助因子分析进一步厘清这8个测量题目的潜在维度。通过探索式因子分析(KMO值0.881, 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的卡方值13 217.294,显著性0.000,总方差解释累计百分比66.12%),最终将其降维为两个因子。由于因子分析具有可命名性,本文依据学界对年轻世代价值观特征的研究,将执政绩效的两个维度分别命名为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前者强调个体对生存与安全等基本需求的价值偏好,后者强调个体对自我价值的表达等更高层次需求的价值偏好^[31]。如前所述,受访大学生对基础性的传统治理事项(国民经济发展、国防和对外政策、医疗卫生、中小学教育)给予更高评价,而对基于权利与理念的发展型治理事项(环境状况、贫富差距、官员廉洁程度和公民政治权利)评价稍低。

(二)回归分析

受访者递交入党申请书的行为与态度,是本文考察其入党积极性的观测依据。从选项来看,因变量对应的“没打算递交”“准备递交”“已经递交”具有程度上逐渐增强的定序特征。不过,相对于“已经递交”这种业已发生的行为,其他两个选项仅是一种主观态度,这又表现出行为一态度的二分变量特征。因此,笔者分别尝试了二项逻辑斯蒂回归、有序逻辑斯蒂回归、多项逻辑斯蒂回归,并对结果进行比较:采用不同回归模型对因变量对各自变量的关系没有本质性的冲突,但多项逻辑斯蒂回归分析能够更为精准地呈现因变量三个类别与各自变量的关系。鉴于此,本文最终将因变量视作三个选项的类别变量,使用多项逻辑回归展开分析。此外,表2中模型1比较了“准备递交入党申请”与“没打算递交”的两类样本之间,在政党认同的若干维度变量及控制变量上的差异。模型2则比较了“已经递交”与“没打算交”两类。

表2 多项逻辑斯蒂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准备递交 vs 没打算交		已经递交 vs 没打算交		准备递交 vs 已经递交	
	发生比	标准误	发生比	标准误	发生比	标准误
中国梦认知	1.945***	0.260	1.496**	0.189	1.300*	0.175
中国梦实现	1.197	0.140	1.162	0.132	1.031	0.112

(续表)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准备递交 vs 没打算交 发生比	标准误	已经递交 vs 没打算交 发生比	标准误	准备递交 vs 已经递交 发生比	标准误
个人梦实现	0.925	0.105	1.008	0.111	0.918	0.097
政党信任	1.227***	0.068	1.186**	0.063	1.034	0.056
政党依赖	1.322***	0.086	1.218**	0.077	1.085	0.071
党员招募标准	1.173 ⁺	0.097	1.418***	0.115	0.827*	0.064
党纪要求严格	0.895	0.074	0.875 ⁺	0.071	1.023	0.080
党风建设评价	0.989	0.097	1.094	0.106	0.905	0.083
党员形象认同	1.050	0.044	1.149***	0.047	0.915*	0.035
执政绩效1	1.056	0.065	0.978	0.059	1.080	0.063
执政绩效2	0.998	0.061	0.880*	0.053	1.134*	0.063
男性	0.773*	0.089	0.442***	0.051	1.748***	0.191
城市户籍	0.786 ⁺	0.106	0.812	0.107	0.967	0.119
汉族	1.329	0.304	1.386	0.326	0.959	0.233
父亲党员	1.254	0.175	1.268 ⁺	0.175	0.989	0.129
母亲党员	0.943	0.173	0.988	0.181	0.954	0.170
父亲教育	1.009	0.071	1.044	0.072	0.967	0.063
母亲教育	0.985	0.071	0.946	0.067	1.041	0.070
家庭社会地位	1.060	0.043	1.002	0.040	1.058	0.039
家庭经济收支	0.941	0.077	0.919	0.073	1.024	0.076
学校类别	1.377***	0.085	3.226***	0.189	0.427***	0.021
理工医专业	0.733*	0.090	0.878	0.108	0.834	0.094
N				3286		
pseudo R ²				0.166		

注: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

如表2所示,在理想信念认同变量中,受访者对“中国梦”的认知表现出显著而稳定的正向作用:如果个体参与过关于中国梦的专门学习,则相对于没打算递交入党申请,其准备递交和已经递交的发生比显著增加94.5%、49.6%。此外,大学生关于“中国梦实现过程中,个人梦想与追求能否实现”的信心,与其入党积极性不具有显著关联。假设1部分得到了验证:在政党价值认同的测量变量中,关于中国梦的认知与学习的确能够促进大学生的入党积极性。

政党情感认同变量,对大学生入党积极性表现出持续的正向推动,个体的政党信任每提升一个层级,入党积极性会显著提升:相对于不打算入党,个体偏向准备递交和已经递交入党申请的发生比增加27.7%、18.6%。政党依赖对个体入党积极性表现出相似的影响模式:个体政党依赖提升一层,其准备递交和已经递交入党申请的发生比增加32.2%、21.8%。这说明,大学生既信任党、又离不开党的情感体验,能够有效地催生其入党积极性。此外,从模型3看,政党情感认同不足以显著使其由主观偏好转化为实际行动。整体来看,假设2得到了验证,大学生的政党情感认同是十分积极有效地入党意愿促进变量,不过,其作用机制更加偏向于入党态度的积极转化而非实际的入党申请行动。

大学生对党组织建设的认同对提升其入党积极性的影响得到了部分验证。具体来看,受访者对近年来党员招募标准的严格程度的评价越高(即越严格),则其入党积极性越高,且这一关系能够在因变量的三个类型中逐渐传递:相对于没打算入党的最不积极选项,分别增加受访者准备申请入党和已经申请入党的发生比为17.3%、41.8%。在准备递交与已经递交之间,也降低了受访者犹豫不定的偏向,使其由更小(降低17.3%)的发生比选择前者。不同于对招募标准严格程度的判断,如果个体认为“对党员的纪律规范的变化”越趋向严格,则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上降低了其已经递交入党申请12.5%的发生比,而使其更偏向不打算入党。不过这一关系仅体现在模型2的两类因变量之间。

党员形象认同共涉及四个测量题目,均值作为党员形象认同变量纳入模型。通过模型2、3分析可知,大学生对身边一般党员的形象认同能够显著地促使个体将入党的主观偏好行动化:个体的党员认同每增加一个单位,相对于没打算入党,其已经递交入党申请的发生比显著增加14.9%;此外,相对于业已递交入党申请的个体,其处于准备递交的犹豫状态的发生比也会显著下降9.5%。回顾来看,假设3中关于政党组织认同的变量中部分得到验证:严格的党员招募标准、正面的党员形象,均可增强大学生的入党积极性。

执政绩效认同对提升大学生入党积极性的影响有限。执政绩效中物质主义因子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执政绩效中的后物质主义因子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表现出对个体入党积极性的弱化效应:后物质主义取向的执政绩效感知提升一个单位,则相对于没打算入党,其已经递交入党申请书的发生比降低12.0%;相对于已经递交,个体偏向于准备递交的发生比增加13.4%。假设4并未得到验证。虽然如此,但对于大学生而言,执政绩效并非其政党情感的负面因素。笔者尝试分析了执政绩效认同与政党情感认同的关系,结果发现前者对后者的显著促进作用^①。这说明,执政绩效认同的确能够显著提升个体对党的正面情感,但这种情感认同与入党积极性却具有不同的生成机制。

从控制变量来看,男性的入党积极性显著低于女性,在中国大学生样本中,政党偏好表现出较为有限的家庭代际传递:模型2表明,父亲为中共党员的受访者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上有更高的发生比(26.8%)属于已经递交入党申请书的群体,而非不打算入党。受访大学生的主观家庭社会地位、家庭经济收支状况,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此外,受访者就读大学的类型每变化一个层次^②,其具有高入党积极性的发生比明显增加。这意味着不同办学层次与类型的高校之间,发展大学生党员需要差异化的工作机制。专业对入党积极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准备提交与没打算递交入党申请之间:模型1中,相对于人文社科专业,理工医专业的大学生准备递交入党申请的发生比要低26.7%。

四、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本研究发现,绝大多数(72.05%)被调查大学生有很强的入党积极性。政党认同呈现出以价值认同主导的多维政党认同特征,且以对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认可和情感认同为主要内

① 分别以政党信任、政党依赖作为因变量,构建有序逻辑斯蒂回归模型,以执政绩效认同两个因子为自变量,以模型1中变量为控制变量,则在0.000的显著性水平上,政党信任模型中执政绩效两个因子的odds ratio分别为1.624、1.543,政党依赖模型中分别为1.763、1.299。

② 学校类别中,1为985大学,2为211大学,3为普通一本二本,4为独立学院,考虑到这四类学校在高考招生批次与录取分数、办学层次等方面具有定序的特质,将其作为定序变量纳入模型。此处每变动一个层级指的是赋值由1至4的变动。

容的价值认同是当前大学生政党认同的主要特征。与此同时,大学生对于党组织的评价较积极,对于党员的评价较为正面,但对于党的执政绩效评价存在差异,对环境保护、官员廉洁和贫富差距的评价较为保守。

大学生的入党积极性受到学校类型的显著影响,政党理想信念认知、政党信任与依赖认同以及党的组织纪律认同对大学生入党积极性具有稳定的积极影响。大学生对执政绩效评价对其入党积极性的影响不稳定。

(二)讨论

1. 入党积极性的代际传递及环境效应

政治社会化理论强调对政党的态度受到父母政治面貌、父母教育水平和家庭收入影响。数据显示,家庭社会地位及父亲的党员身份对大学生的入党积极性正相关。这一研究与之前的研究一致,即“家庭成员的政治面貌与受教育程度对大学生的政党认同影响呈现一种较高的正相关关系”,但之前研究中发现的“家庭收入对大学生的政党认同呈现一种负相关的关系”^[32]在本研究中并不存在。同时,本研究发现在引入其他因素后除了父亲的党员身份仍具有边际显著性之外,其他家庭因素的影响均不存在。可见对于大学生来说,父亲党员身份具有一定的代际传递性,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政治社会化中家庭因素的影响,但家庭地位及经济收入对入党积极性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证实。

在环境效应中,不同类型学校学生在入党积极性上的差异稳定存在。考虑到的教学方式、校园文化和给学生提供的发展机会可能会有所差别,这有可能源于不同学校学生在求职市场上的竞争力,而党员身份成为层次较低学校弥补自身专业劣势的重要手段。另外,层次较高的学校可能能够给学生提供更多出国交换的机会,这些学校的学生则更有可能受国外的价值观念的影响,从而降低自身的入党积极性。从专业类别来看,文科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等关于党的思想和知识较理工科学生要更为了解,同时在求职中,理工科学生的主要就业类型是专业技术类的工作,目前来看这一类的岗位对个人的政治面貌要求很少,有可能成为其入党积极性相对不足的直接原因。在人口学因素中,性别具有较为稳定的效应。女大学生的入党积极性明显要比男大学生高,且这一影响具有稳定性。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越来越多的用人单位以“是否党员”作为用人标准,加上女性在职场中的劣势,因此女大学生有一种紧迫感来加入共产党成为党员,以适应就业竞争需求。

2. 政党价值、政党组织与入党积极性

以政党理想信念认同和情感认同为主要内容的政党价值认同是入党积极性的重要影响因素,且具有很强的稳健性。吴心喆等研究指出,在中国特殊的环境下,对于党的依赖是影响其信任不可或缺的因素^[33],本研究表明大学生对政党的信任和依恋是产生支持和认可的情感基础,是向党组织靠拢的重要引力。由于大学生对于“中国梦”这个重大议题的评价体现了其对于党发展战略的认同,是决定其是否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付出行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为了提高大学生入党的积极性,有必要加强对于“中国梦”的宣传和学习。要提升大学生对国家和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促使大学生自觉将实现人生自我价值与实现党的价值结合起来;加强大学生对党史、党建、形势政策的学习,提高大学生对于党的发展战略的认同。

对党组织建设举措与实效的认同中,大学生评价近十年来党员招募标准越严格越吸引其入党。严格的招募标准在吸纳优秀青年入党保证党员质量的同时更具有身份区隔意义和象征意义,是保持党员队伍纯洁性和先锋作用的重要基础。基于党组织建设标准而产生的政党认同和入党倾向具有更重要的行为导向意义。身边党员的影响表明,大学生入党并

非简单的从众行为,也受到自身对政党组织评价的影响。

由于党员所具有的示范作用,大学生对身边党员的总体评价对于其入党积极性有正向影响。数据显示,大学生对身边党员总体评价较为积极,但党员道德评价和入党动机的均值低于中位数,评价较为保留。这表明,一般学生党员的先进模范作用需进一步加强,学生对党员的评价和接受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尤其是入党动机方面。因此,有必要提高对于党员整体素质的要求,尤其是加强党员道德素质。要从情感上、组织上、队伍建设上着手,提升大学生党员的主体性作用,促使大学生党员积极参与政治实践,纠正政治取向的偏差,调节负面政治情绪,坚定政治信仰,塑造健全的政治人格。

3. 理性认识执政绩效

之前的研究认为民众对政党的认同和靠近是以民众利益的获取和满足为前提的,如大学生对社会治安、教育公平和民主参与、食品安全满意度为指标的获得感对政党支持具有显著正向作用^[34],且相比于执政价值,大学生执政效能认同对入党意愿的影响力更强^[35]。本研究发现,当前大学生对国防及国民经济发展的评价最高,但该评价对其入党积极性没有任何影响,这与之前研究一致,对北京大学生的研究发现只有7.6%的大学生因功绩性因素而认同共产党^[36]。也就是说,由于相比于“80后”,中国“90后”青年更具有后物质主义价值倾向^[37]。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之后,1995年之后出生的大学生已脱离了物质匮乏且将经济发展、国防力量的强大视为理所应当,因此尽管学生对这类物质主义维度绩效评价普遍较高,但其作为学生加入共产党员的诱因下降,相反,他们对环境保护、公民权利、反腐等议题的关注和要求增加。而不同维度的绩效评价对入党积极性的影响也体现了“木桶效应”,即入党积极性取决于评价最低的维度。目前中国进入科学发展、全面发展时期,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党组织的扩大和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遇。

从理想信念、情感认同、绩效认同和党员示范作用的影响效应来看,当前大学生入党积极性主要受内部因素的影响,如理想信念和情感认同,而执政绩效、党员示范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较弱且不稳定,由于外部因素易受社会环境影响,而信念则源于个体的深刻体悟和灵魂深处的肯定,故而更为稳定。因此,“内部因素大于外部因素尤其是对政党意识形态的信仰和认同是政党认同形成的最稳固的根基”^[38]。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对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和情感教育便具有重要意义且已显现出明显的效果。

“加入中国共产党”无论在革命年代还是当下对于个人的发展来讲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吸纳社会中先进成员加入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长久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入党积极性影响因素中所显示出的对政党认同的理性和功利意识,需要重视政党的执政基础和认同资源。需要进一步强化对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和政党情感教育,加强对大学生党员的道德教育及入党动机教育。就执政绩效而言,政党情感认同与政党参与偏好存在生成机制的心理差异。

本研究从党的理想信念和情感认同、党的组织建设及党员形象认同以及执政党绩效认同多方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良好信效度的系统化政党认同测量指标,并利用不同层次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当前大学生的政党认同状况以及这一心理认知与其入党行为的关系。本研究结论可用于全面理性认知大学生的政党态度,提高壮大高校党员队伍、提升高校党建工作的科学性和针对性。但由于样本采集以大学生为主,本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其他青年群体仍有待进一步验证。本研究只利用大学生入党的截面数据分析其影响因素,缺少对个体从入党积极分子到预备党员进而成为正式党员这一过程的动态分析及对不同阶段影响因素的差异研究,这也是后续研究的重点。

[参 考 文 献]

- [1] 《2021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 <https://www.12371.cn/2021/06/30/ART11625029938331844.shtml>
- [2][24][36][38] 柴宝勇:《理性与功利:当今中国政党认同的现状、特征与构建途径——基于北京某高校的数据》,载《理论月刊》,2015年第9期。
- [3] 戴维·米勒等:《布莱克维尔政治学大百科全书》,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8-70页。
- [4] Russell J. Dalton, Martin P. Wattenberg. Parties Without Partisans: Political Change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5] Miller Warren E., Shanks J. Merrill. The New American Voter.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74.
- [6] Greeno, S.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of Partisanship, Political Behavior, 2002, (3).
- [7] Green, Donald Philip, Bradley Palmquist. How Stable is Party Identification? Political Behavior, 1994, (4).
- [8] 王庆兵:《从历史制度主义路径看英、美两国政党认同的转换》,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年第4期。
- [9] 柴宝勇:《论政党认同的含义及其要素》,载《探索》,2009年第1期。
- [10] 李俊:《非公企业党建内在动力培育研究——基于政党认同的视角》,载《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2年第2期。
- [11] 沈传亮:《当代中国群体政党认同的实证分析——以公务员群体为对象》,载《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 [12] 李云:《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政党认同心理的实证研究——以尔德井村为例》,载《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3期。
- [13] 罗莹 徐沐玥 程实:《在沪台湾青年的政治认同研究》,载《中国青年研究》,2017年第4期。
- [14] 罗章 张俊伟:《分析与对策:当代中大学生政治认同研究——以重庆市学生联合会的专项调查为例》,载《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 [15] 郑建君:《政治沟通在政治认同与国家稳定关系中的作用——基于6159名中国被试的中介效应分析》,载《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1期。
- [16] 刘涵慧:《大学生的政党认同与国家认同——基于北京高校的实证研究》,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1期。
- [17] 张平 彭舟:《大学生政党认同的生成机理与提升策略——基于984例样本数据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7年第1期。
- [18] 王劲松 林天翔:《从当代大学生的入党动机谈高校学生党建工作》,载《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11期。
- [19] 齐卫平 杨帆等:《当代大学生入党动机问题的研究》,载《思想理论教育》,2007年第17期。
- [20] 杨守鸿 杨聪林:《改革开放40年大学生入党动机的演变及其教育启示》,载《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 [21] 刘利萍:《新时期大学生入党动机研究》,西南石油大学2016年硕士论文。
- [22] 姚斌:《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高职学生入党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载《职教通讯》,2020年第2期。
- [23] 柴宝勇:《论中国的参政党认同:问题及对策——基于政党认同形成基础的分析》,载《探索》,2011年第3期。
- [25][35] 蒋荣 代礼忠:《从执政效能和执政价值认同看当代大学生的政党认同——基于重庆大学与西南大学的经验材料》,载《青年研究》,2011年第3期。
- [26] 李艳霞:《论政治科学理论叙事中的概念界定与测量——以“政治认同”为例》,载《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12期。
- [27] 季乃礼:《政治心理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9页。
- [28][30][33] 吴心喆 余泓波:《从政治依赖视角解释中国的政治信任——一项基于大学生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4期。
- [29] 唐云 王英:《主客观视角下的制度绩效、政治效能感与政治信任》,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0年第5期。
- [31] 李艳霞:《“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当代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以代际差异为视角的比较分析》,载《公共管理学报》,2017年第3期。
- [32] 柴宝勇 徐博文等:《家庭因素与大学生政党认同——基于北京某高校的数据》,载《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6年第3期。
- [34] 石庆新 傅安洲:《获得感、政治信任与政党认同的关系研究——基于湖北省6所部属高校大学生的调查数据》,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 [37] 魏莉莉:《青年群体的代际价值观转变:基于90后与80后的比较》,载《中国青年研究》,2016年第10期。

(责任编辑:张丹)